

中国 传统

钱茂伟 ◆ 著

Zhongguo Chuantongshixue De Fanxing Shanbian

史学的范型嬗变



2009年度宁波市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8年度宁波市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 传统

钱茂伟◎著

Zhongguo Chuantongshixue De Fanxing Shanjian

史学的范型嬗变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史学的范型嬗变 / 钱茂伟著. —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 - 7 - 207 - 08622 - 8

I. ①中… II. ①钱… III. ①史学—研究—中国
IV. ①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1701 号

责任编辑:姚虹云

装帧设计:贾德铭

中国传统史学的范型嬗变

Zhongguo Chuantongsixue de fanxing shanbian

钱茂伟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哈尔滨金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390 000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08622 - 8 / K · 1053

定 价 46.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

（代序）

对中国传统史学客体的认知,是一个无穷的过程。转换一下角度,就可能看到一些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新知。本书所谓“传统史学的范型”,正是笔者近十多年用新视野探索传统史学的结果。

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分期,人们常用“发生”、“发展”、“繁荣”、“衰落”等词汇。这种分期法着眼于史著的数量与质量,偏重外在形态的发展变化,却没有揭示出史学内在的发展理路。近十多年来,笔者一直主张从史学内部范型的嬗变来看传统史学发展历程。传统史学的发展有一个阶段性,不同阶段流行不同类型的治史模式。这种模式,借用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术语可以称为“范型”。笔者的理解,范型是一种学术研究方式,即不同的范型拥有各自的理论与方法、学术群体成员内部接受共同的信念与价值、使用相同的技术手段等。

不管你承认与否,中国传统史学的确存在着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叙事史学、以宋明义理史学为代表的义理史学和以乾嘉史学为代表的考据史学三大史学模式,可以称为三大范型。大体说来,周唐时期,以《左传》《史记》为代表的叙事史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宋明时期,讲纲纪的义理史学开始占据主流位置;明清之间,考据史学得到相对充足的发展。当然,这样的概括是粗线条的,而且是就主要方面而言的,不是一个时代史学发展的全部内容。类型说的提出容易把握史学发展的主流,但有可能忽视、遮蔽支流。

传统史学范型问题的存在,古人早已认识到。汉唐时期的学人们注意了由古史到新史的转型,即由《春秋》风格国史到司马迁《史记》风格国史的转

型。“夫史、汉，固史之变也。自三代而上，史家率多编年，征事则初终易核，论世则污隆易稽，修辞则伦类易析。《春秋》衰焉，加之以褒贬，述而不作，神而明之矣。”^①这样的变化，二十世纪以来传统的说法是体例的更新，在今天看来是建构模式的转换，即由单一的以时间链建构历史的模式向以人事为中心的综合建构模式的转型。

而到了宋元明时期，在传统的叙事史学之外，增加了一种新类型的义理史学，人们的认识越来越明晰。早在隋末，大儒王通（584—617）就已指说：“史之失，自迁、固始也，记繁而志寡。”^②这个观点，为宋人吕本（1084—1145）诸人所继承。^③何谓“记繁而志寡”？宋人阮逸的注释是“但务广记而不原圣人教化之志”^④，考虑到王通是理论家，这一理解是准确的。^⑤南宋初年，胡寅（1098—1156）称《通鉴》“事备而义少”^⑥。元末人郑驹（1320—1378）“论及史传，以为司马光《资治通鉴》专于纪事，朱子纲仿《春秋》，目仿《左氏》，因事以明理，自成一家。”^⑦元初人郑思肖（1241—1318）说：“自《春秋》后，史笔不知大伦所在，不过纪事耳。”又说：“纪事而不明正理，是者非，伪者正，后世无以明其得失，诸史之通蔽也。”^⑧这就是说，周唐史学是一种以记事为中心的叙事史学，而宋元是一种以探讨“大伦”为主旨的义理史学。前者特点纪事，后者因事以明理，风格完全不同。由此，人们对史学性质的定位也不同。明代史家王洙（1485—？）说：“史者，《春秋》之教也。”^⑨元末明初史家杨维禎（1296—1370）说：“《春秋》，万代之史宗也。”^⑩汉唐以来，一直崇尚《史记》、《汉书》，以司马迁、班固风格为标准史学，现在竟提出以《春秋》风格为史学的典范，这是

① 叶向高《苍霞草》卷八《重刻通鉴纲目序》，《四库禁毁书丛刊》。

② 王通著、阮逸注《中说》卷二《天地篇》，《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③ 吕本中《春秋集解》卷八，《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④ 王通著、阮逸注《中说》卷二《天地篇》，《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⑤ 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三四《史籍类》（《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将“记繁而志寡”理解为纪传体中的纪详而志略，恐误。

⑥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四《读史管见》，《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⑦ 郑真《荜阳外史集卷》四二《亡兄金华府义乌县儒学教谕郑先生行状》，《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⑧ 郑思肖《心史·古今正统大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⑨ 王洙《宋史质·叙例》，见《宋史质》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⑩ 杨维禎《三史正统辨》，见贝琼《清江先生文集》卷二《铁崖先生传》，《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宋明史学发展的一个新现象。明代学者陈懿典(1573—1657)认为,传统中国史学存在以《春秋》为代表的“圣人之史”和以《史记》为代表的“史臣之史”两大类型,圣人之史自然高于史臣之史。^①叶向高(1559—1627)说得更直白:“吾以为史家自《春秋》后,史、汉,支子也;《纲目》,其世嫡也。”^②这是说,《春秋》后有两种风格的史学,《纲目》是世嫡,史、汉是支子。将义理史学升为世嫡,而把叙事史学降为支子,这是宋明史学发展的最新特点。这种升降,正反映出宋明时期传统史学内部范型的升降。

叙事史学“事备而义少”,“记繁而志寡”。那么,《纲目》之类义理史学就是“事少而义备”、“记寡而志繁”。在历史著作上,记与事,义与志,其间比例的不同就构成了叙事与义理两种不同类型史学的基本特征。所谓义、所谓志,就是强调史著的编纂应有自己的思想加以指导。在宋明时期,这种义、志,就是以理学“三纲五常”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义理史学以《春秋》为鼻祖,当然是新《春秋》史学。具体地说,要求“扶天理,明伦理;内夏外夷,正名定统;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者”^③。就国内、国际关系来说,“内夏外夷,正名定统”;就国内来说,“扶天理,明伦理”。这么做的目的是“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者”,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局面。总之,义理史学偏重史学的价值判断,而叙事史学更偏重事实判断。

宋明史学确实存在理学化与非理学化两条主线。当然,说宋明史学有两条主线,不是说它们之间没有升降消长的变化。事实上,宋明时期两种范型史学之间不断有较量,互有升降。大体上说,北宋至南宋初期,是叙事史学占上风,义理史学居次要地位。南宋中期《纲目》出版至明中期,义理史学在学者群中开始居上风,叙事史学遭到冷遇,只有官方修史仍坚持了叙事史学传统。明中期以后,义理史学逐渐遭人否定,叙事史学范型又逐步占据上风。晚明清初史学的主流无疑是非义理史学。这其中,有传统的叙事史学,也有新兴的启蒙史学。启蒙史学符合时代发展趋势,但在当时中国难以生根。结果,叙事史学占据上风。当然,明末清初,义理史学的东西没有完全消失,仍有存在。宋

① 陈懿典《天佚草堂史书纂略序》,见马维铭《史书纂略》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② 叶向高《苍霞草》卷八《重刻通鉴纲目序》,《四库禁毁书丛刊》。

③ 周叙《石溪文集》卷五《修明统纪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明史学的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由叙事史学到义理史学,又由义理史学到叙事史学的两次大的转型。前一次大的转型正是宋代史学发展的基本历程;而后一次大的转型则是明代史学的基本历程。

到了明末以后,人们的看法再次变化。王志坚说:“古之好议论者,莫如宋人,皆迂刻不情,或取以立教,而不顾岁世之所宜。”^①黄宗羲说宋明学者“不度时势,漫为褒贬”^②。王鸣盛说宋明人“略通文义,便想著作问世;一涉史笔,便欲法圣人笔削”^③,又说“读史者不必以议论为法戒,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予夺,而当考其事迹之实”^④。钱大昕说:“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见,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纷之也。”^⑤这表明,清代史学不同于宋明史学。那么清代史学是什么类型?笔者的看法是考据史学。所谓考据史学,是指用文献讨论手段来治史的一种史学类型,以乾嘉考据为代表。文献考据学是传统中国晚期的经典学术形态,主要始于宋代考据学,尤其是王应麟的文献学。元明之间,文献考据一度衰落。明代考据学诞生于嘉靖时期,它是针对宋明义理史学而兴起的。杨慎被认为是明朝考据学的鼻祖,其后有陈耀文等人,多偏重经部、子部。史部考据是从万历初期开始的,主要人物有王世贞《史乘考误》、胡应麟《史书占毕》与《四部辨伪》、周之纲《史乘纂误》、张燧《千百年眼》、周婴《卮林》、钱谦益《太祖实录辨证》、潘耒《国史考异》、朱明镐《史纠》等专业历史事实考据著作的出版,标志著晚明史学考信风格的确立。至清代中叶乾嘉时代,考据学发展为成熟的考据学。考据本质上是一种文献的讨论与再研究。与现代西学相比,关键是没有逻辑思维做支撑。具体地说,有五个不同:一是研究对象的不同,考据学以文献为对象,西学以事实为对象。二是发现问题方式不同,考据学是读书发现,西学是逻辑提问。三是论证方式不同,考据没有逻辑,故而论证简单,而西学须运用逻辑之法,故论证较复杂。四是语言表达方式不同。五是知识建构方式不同。考据成果的表达多为小札记,以书为中心,随意地将知识汇

① 王志坚《读史商语·自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② 黄宗羲《陈同亮刻〈胡传〉序》,《南雷文定》四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

③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二《唐史论断》,中国书店,1987年。

④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自序》,中国书店,1987年。

⑤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三《唐书直笔新例》,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编在一起,大体先后布局而已,随意性较强,没有体系,别人理解比较困难;而西学的成果表达方式是有框架的专题论著。

叙事史学有两大特点,一是述而不作,前人的文字表达可以直接继承,只要增删一些文字即可;二是寓论断于叙事之中,作者的观点不直接体现,至多在末尾加一段评论。只有叙述,没有讨论,是叙事史的特点。其结果是,只能在模式的创新上下工夫。所以,观察周、唐间史学发展的重点是体裁的变化。叙事史学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实证史学,但宋明间传统史学因受国家强大政治力的干涉,走上了义理史学之路。义理史学本质上是政治干涉史学,要求用现实政治观念观察历史,它符合国家利益,但有违学术发展规律。明代中叶以后,义理史学走到尽头,传统叙事史学复兴,班、马重新受人推崇,考信风重兴。晚明清初当代史编纂大兴,作品数量大增。随着明代叙事史学的发展,叙事史学自身的不足也日益体现出来。叙事史学不在内容讨论上下工夫,只增删文字,按老模式建构作品,就会变成抄袭。在作品数量不多的时代,这个问题不突出;一旦作品数量增加,重复问题就暴露出来。部分高明的史家,如王世贞、钱谦益,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要求讲史法,先做长编,中做考异,最后写书。议论应是学术化议论,而不是政治化议论。史论的转变,就是王世贞、李贽与张燧学术史论的出现。由政治化史论到学术化史论转型,这是认识论进步的表现。也有部分学者,如王应麟、杨慎、胡应麟、顾炎武、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只管写札记,不想写专著,他们发展出了独立的考据学。史学考据学成长的过程,反映的是传统史学学术化过程,反映的是科学历史知识的增殖过程。考据学的优势是有了相对充足的讨论,缺陷是为考据而考据,没有了更高形态的体系建构。在义理精神荒废史学之后,这样的学术方式是需要,可以还史学一片干净的天空,但考据学时间不能过长,数量也不能太多,更不能成为独立的、全部的学术形态。考证之后应有更高层面的一家之言,完整的一家之言应是理论的一家之言、知识的一家之言、文字表达的一家之言、结构的一家之言。其写作风格,既不全全是叙事,也不全是议论,而是夹叙夹议。章学诚出来大声疾呼,就是希望在考证基础上建构起更大规模的通史。章氏史学的高明在于捕捉到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学术化、近代化发展方向,梁启超正是沿着章学诚的路径走下去的,中国史学也正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过来的。

笔者对宋元明史学思考稍多,而于此前的周唐史学与此后的清代史学思

考较少,故而本书内容的论述上也体现出这个特点。上篇叙事史学,谈了早期叙事史学发展轮廓,编年史的叙事特征,重点讨论晚明及清初的叙事史学。中篇义理史学展开较多,某些内容如正统论、旧史改编之类,可参考笔者的《明代史学的历程》相关篇章。下篇考据史学略显单薄,主要由三大块内容组成,一是从考信与启蒙角度对义理史学的清理,使史学趋向学术化;二是当代史编纂中提倡考信精神;三是古学思潮下的前代史考据。笔者即将出版的《王应麟的历史世界》,略可弥补本书考据史学论述不足之缺。幸学界考据史学研究成果颇丰,有林庆彰《明代考据学研究》、罗炳良《清代乾嘉历史考证学研究》、庞天佑《考据学研究》、郭康松《清代考据学研究》、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诸书可参考,本书就不再涉及。

一个学科发展的关键是增强自身的活力,而增强活力的关键是研究模式的创新。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传统史学方方面面的课题都涉及到了,已成为一块成熟的“领地”。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需要借助新的史学理念,对传统史学研究的模式作清理与整合,使之更加理论化、科学化。本书的基本思路是将传统史学分为叙述、评判、求真三大层面,进行分层专题研究。传统史学的研究,有通代史与断代史之分,有体裁之分,有官修与私修之分,有庙堂与江湖之分,没有形态之分,至今未见将叙事史学、义理史学、考据史学作为一个整体形态加以系统考察的专题著作。本书只是笔者对传统史学三大类型探索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出版这部书,是希望学界有更多的人树立创新意识,应对史学领域内外变化的挑战,呼应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发展趋势,促进传统史学研究方法、视野的转换,提升传统史学的研究水平。

钱茂伟

2010年1月于宁波柳庄

目 录

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代序) (1)

上篇 叙事史学

第一章 早期史学由记事而叙事的历程	(3)
一、甲骨问事:成文化片断历史记事的出现	(4)
二、金文铭事:单篇文献的出现	(9)
三、春秋时期:连续性历史记录文本的出现	(10)
四、孔子《春秋》:历史编纂的开创	(15)
五、《左传》:以事系人叙事风格的确立	(17)
六、《史记》:多重叙事风格的确立	(21)
七、余论	(22)
第二章 编年史的叙事特征	(24)
一、叙事本为中国史学正宗	(24)
二、纲目史的叙事特征	(27)
三、史著仅有叙事是不够的	(34)
四、历史叙事是可以不加注释的	(36)
五、结语	(38)
第三章 明中叶叙事史的复兴	(40)
一、明中叶当代史研撰的勃兴	(40)
二、嘉隆时代明史编纂的特征	(43)
三、嘉隆时代明史编纂勃兴的原因	(46)

第四章	富有时代光泽的《皇明通纪》	(49)
一、	话旧:九十年代重新发掘出来的“文物”	(49)
二、	按语:《通纪》的核心价值所在	(51)
三、	论功:明代通史的拓荒之作	(55)
四、	启示:《通纪》精神的理性思考	(56)
第五章	分类叙事的何乔远《名山藏》	(58)
一、	“立朝持正敢言,博览好著书”的一生	(58)
二、	“分事别类”的史体	(61)
三、	“标目寓劝惩”的史例	(63)
第六章	求体例创新的朱国祯《史概》	(67)
一、	阁老担史任	(67)
二、	一生心血采拾成书	(68)
三、	兼诸家之体	(71)
第七章	规范中求变异的尹守衡《史窃》	(74)
一、	“清朝逸史”	(74)
二、	一部规范与个性相结合的明史	(81)
三、	晚明叙事作品的软肋	(85)
第八章	晚明叙事史的繁荣	(88)
一、	晚明当代史编纂繁荣的表现	(88)
二、	晚明当代史编纂繁荣的原因	(89)
三、	晚明明史编纂的特点	(92)
四、	晚明明史编纂的成就与不足	(95)
第九章	清初的明史编纂的蔚然成风	(97)
一、	顺治朝纂修通代明史著作成风	(97)
二、	清初明史学的特点及历史地位	(99)
三、	公私“合营”的康熙朝明史学	(103)
第十章	明末清初史坛的新气象	(107)
一、	南方地区修史成风	(107)
二、	史家间横向交流的加强	(109)
三、	编纂方式的集体性与整体性	(113)
四、	结论与余话	(119)

中篇 义理史学

第十一章 义理史学的基本特征及演变轨迹	(123)
一、义理史学释义	(123)
二、义理史学的基本特征	(125)
三、义理史学的演变轨迹	(129)
四、义理史学的评估	(132)
第十二章 范型嬗变的宋代史学	(134)
一、由叙事而评判:史学理念的转变	(134)
二、由史事而史义:史学编纂模式的嬗变	(136)
三、由附庸而大国:义理史学在南宋后期史坛的渗透	(139)
第十三章 彰景范的名臣录编纂	(143)
一、宋以后名臣录的编纂	(143)
二、名臣录的特点	(147)
三、名臣录编纂的原因	(150)
四、名臣录的价值	(151)
第十四章 用义理观照历史的《困学纪闻》	(153)
一、通过历史来明天理、正人伦	(154)
二、以忠孝节义思想观察历史人物	(159)
三、由君子小人说观察历史	(164)
四、注重社会风俗的升降	(165)
五、结语	(169)
第十五章 杨奂、郑思肖正统论的新元素	(170)
一、杨奂正统论: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也	(171)
二、郑思肖正统论:君臣、华夷,古今天下之大分	(174)
三、郑思肖的史学编纂实践	(180)
第十六章 理学笼罩下的明前期史学	(184)
一、义理史学的凸显	(184)
二、当代史编纂衰弱不振	(188)
三、“西洋”史地学异军突起	(191)
四、反义理史学初露端倪	(192)

第十七章 以经义断前代之是非	(196)
一、郑棠与《元史评》	(197)
二、赵弼与《雪航肤见》	(203)
三、周礼与《续资治通鉴纲目发明》	(207)
四、刘定之与《宋论》	(213)
五、何乔新与《宋元史臆见》	(218)
六、许浩与《宋元史闡幽》	(221)
第十八章 治统与道统视野下的通史编纂	(224)
一、认识论视野下的通史编纂	(225)
二、“主于明统”的《史统》	(228)
三、从《史统》看历史解释作品的评价	(234)
四、结论	(236)

下篇 考据史学

第十九章 王世贞对义理史学的批评	(241)
一、义理史学批评思想的形成轨迹	(241)
二、对春秋笔法、正统论与道统说的批评	(243)
三、对宋儒史论的重新解读	(246)
四、结论	(249)
第二十章 用启蒙思想透视义理史学	(250)
一、李贽对义理史学方方面面的批评	(250)
二、李贽对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	(253)
三、李贽史评的阶级思想基础	(259)
第二十一章 学步司马迁的弇州史学	(263)
一、从历史上对弇州史学的评价说起	(263)
二、关于弇州的明史稿	(264)
三、弇州在明代史学上的贡献	(268)
四、结语	(272)
第二十二章 讲史法重考信的牧斋史学	(274)
一、修明史,毕生孜孜以求的夙愿	(274)
二、讲史法,牧斋史学的高明之处	(280)

三、惟考信,牧斋史学的缺陷所在	(282)
第二十三章 晚明考据史学杰作《千百年眼》	(285)
一、张燧及其《千百年眼》	(285)
二、考信思潮下的《千百年眼》	(288)
三、《千百年眼》可贵的学术思想	(290)
四、《千百年眼》关于史学自身的思考	(295)
五、《千百年眼》的历史地位	(297)
第二十四章 开清代正史考据先河的《史纠》	(300)
一、其人其书	(300)
二、考史方法	(302)
三、评史理论	(303)
四、历史地位	(308)
参考文献	(309)

上篇 叙事史学

周唐时期，以《左传》《史记》为代表的叙事史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历史叙事是将前一时空中发生的事情转换为当下时空可以理解的事情。以历史叙事为主的史学形态，可称为叙事史学。它强调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特点是『事备而义少』、『记繁而志寡』；偏重事实判断，强调实录信史精神。

由编年史而纪传史而纪事本末体，从中国叙事传统视野来看，仅是叙事单位不同而已。编年史的叙事特点是以时间为经，纪传史的叙事特点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多元叙事，而纪事本末体的特点是以单一事件为叙事单位。



第一章

早期史学由记事而叙事的历程

先秦史学,一般的说法是中国史学的产生期,白寿彝称其为史学的童年^①。专题探讨中国早期史学的论文不算少,整体的研究成果多体现在现行各种中国史学史教科书中^②。关于中国史学的起源,自王国维以来学者一直有着丰富的讨论,主要着眼于史官记录(王国维)与口头传说(胡适)两大类型。而针对史官记录,又有着重书写记录(王国维)与宗教功能(劳干等)两类观点^③。

当下对东、西方新叙事史的重视,使我们得以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史学的优势所在。叙事史无疑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优势,但在史学科学化思潮中,我们在相当长时间内忽视了它的存在。在现代历史学占领专业市场的同时,我们放弃了社会市场,历史学离普通大众越来越远。西方历史学界较早地注意到了史学科学化的弊端,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转而重新推崇叙事史,这就产生了新叙事史流派。^④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传入中国以来,我们重新发现了历史叙事的魅力所在^⑤;同时也使我们注意到,叙事是战国至唐朝间中国史学的一大优势。由于重新发现了传统史学的叙事优势,促使我们转换视角,从叙事的产生与发展来思考传统史学的起源与发展。按照这个路径,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这么几个问题:叙事是什么?叙事是如何来

①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7页。

② 中国史学史的编纂,应有自己的解释理论。传统的史学史,只有叙述框架,往往缺少分析框架。表现为教科书喜欢构筑完整的叙事文本,新旧知识“一锅煮”;缺乏分析术语,理论水平落后。

③ 王国维《释史》,《观堂集林》卷六,中华书局,1959年;劳干《史学的结构及史官的原始职务》,见杜维运、黄进兴《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第一册),台北:华世书局,1976年。

④ 劳伦斯·斯通《叙事史的复兴:对一种新的老历史的反省》,古伟瀛译,见人文书会《历史:理论与批评》第二期,2001年;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

⑤ 江政宽《历史、虚构与叙事论述: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时报阅读网。